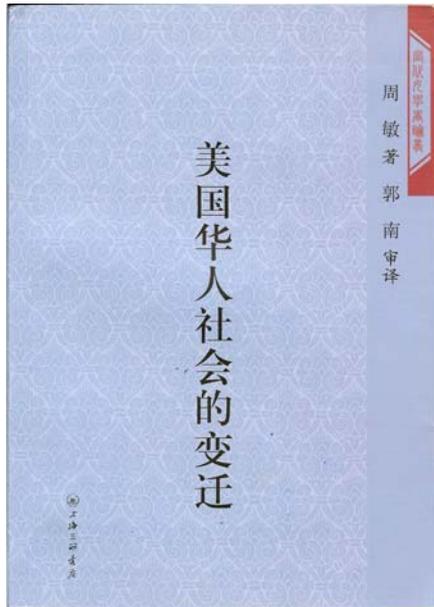


《美國華人社會的變遷》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America

周敏 著 郭南 審譯

上海三聯書店出版社 (2006)



摘要：《美國華人社會的變遷》一書已于2006年10月由上海三聯書店出版社出版。作者周敏運用嚴謹的社會學理論和分析方法，獨辟蹊徑，以開闊的視野和敏銳的目光，向讀者展示出美國華人社會多元化和多層次的立體畫面。該書的14個章節深入地探討和解釋了當代美國華人移民和華人社會面臨的種種問題和挑戰，對華人社會的各個層面及其變遷展開了系統的學術研討和實證分析，其中包括以下有關重點課題：當代華人國際移民的趨勢、動因與結果；美國政府有關華人華僑政策的演變對華人口增長和社區發展的影響；種族隔離與華人居住模式的變遷；華裔與其他少數族裔的關係唐人街的形成、變遷與發展；老唐人街與新華人郊區聚居區的比較；華人社團組織的社會功能及其變遷；華人聚居區族裔經濟及其社會作用；移民家庭結構和代際關係的變遷；華人的文化認同與同化；華文傳媒對文化同化的影響；華人婦女在華人聚居區族裔經濟的作用；中文學校和華文教育；華人移民子女以及小留學生的教育狀況等等。

目錄

作者簡介

序言

波特斯 著

劉宏 譯

中文版出版序言：我的社會學之路

美國華人社會人口和社區的特點及其發展趨勢

“模範少數族裔”與“永久的外國人”

郭南 譯

雙城記：紐約與洛杉磯兩地新華人社區的比較

郭南 譯

華人移民居住模式的變遷和動因

移民社團組織的變遷

華文媒體的發展和影響

族裔經濟理論的形成、發展和研究動向

族裔資本的分析與探討

美國亞裔和華裔經濟的發展動因与結果
唐人街族裔經濟中女工的社會角色和作用
美國的中文學校和課外輔助教育系統
移民家庭的代際關係与跨文化沖突
家庭和族裔環境對新移民子女成長的影響
南加州“空降式”小留學生問題初探
后記

劉宏 譯

李堅 譯

附錄：主要專用名詞和概念的中英文對照

中文版出版序言：我的社會學之路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 屈原

回想起來，我的社會學之路已經走了二十多年了。1982年畢業于中山大學后，我留校到社會學系當助教。當時正值中國重建社會學之際，我有幸為許多來中山大學講學的英美社會學家當翻譯，開始接觸社會學，并對此感到十分新鮮有趣。在華裔美國教授林南先生的引導和幫助下，我于1984年赴美留學，攻讀社會學博士學位。1989年在奧爾本尼紐約州立大學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Albany) 完成學業，獲得社會學博士學位。我的博士論文《從紐約唐人街看少數民族聚居區族裔經濟對移民的社會適應和文化認同的影響》獲得了該校1989年度最佳博士論文獎。從此開始了我在美國大學的教學和研究生涯。1992年，我的第一本學術著作《唐人街》在美國出版，為我的事業奠定了理論基礎和發展方向。隨後，我憑著自己的刻苦努力，從南部一所名不見經傳的州立大學 (路易斯安納州州立大學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起步，終於成為遐爾聞名的洛杉磯加州大學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的終身教授。

在二十多年的學術生涯中，我致力于研究移民社會學、城市社會學、民族社會學和亞裔研究學。我的研究主要是從社會學的角度來展開，學術課題主要集中在：國際移民，美國移民的社會適應與同化，民族和種族關係，亞裔族群及其社區，少數族裔經濟，移民和本土少數民族的居住、就業和社會同化模式，社會分層和社會流動，社會平等與種族歧視，美國本土少數民族與移民少數民族之間的關係，少數族裔移民第二代的教育，以及亞裔青少年文化等等。在美國華裔、華人移民和華人社會的研究方面，我比較側重研究的課題包括：唐人街的形成和發展；老唐人街與新華人聚居區的比較；華裔社區組織的功能和變遷；華裔聚居區經濟及其社會作用；當代華人國際移民的趨勢、動因與結果；移民家庭結構和代際關係的變遷；華人的文化認同與同化；華文傳媒對文化同化的影響；華人婦女在華裔聚居區經濟的作用；中文學校和漢語教育；華人移民子女的教育和就業狀況；美國政府對華人華僑政策的演變；美國反華排華運動和排華法案對華人人口自然增長率和華裔社區發展的影響；種族隔離與華人居住模式的變遷以及華裔與其他少數族裔的關係等等。

本論文集收入的十多篇論文，詳盡地描述了美國華人社會的歷史變遷和多元化的發展過程及其前景。對當代華人移民的社會、經濟、文化生活和適應模式作了理論上的闡述和詮釋。經過修改提煉和注入最新的美國人口普查資料和其他數據，資料更為翔實豐富。當學術界慷慨

地贊揚我對美國社會學、尤其是亞裔研究學作出了突出貢獻的時候，回首往事，我感到我的努力成果可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

一、唐人街、移民社區以及移民社會適應和文化同化的研究

我最初的研究興趣是美國族裔聚居區（ethnic enclaves）及其對於移民社會適應和文化同化的作用與影響。在選擇博士論文題目時，我想到了要研究唐人街。當時我選擇紐約唐人街這個經久不衰的華人移民社區作為研究對象時並沒有想到要著書立說，獨創學派，一鳴驚人。更無意去挑戰什麼主流派的理論。作為初生之犢，我注重的是如何揚長避短，充分利用自己的優勢和各種便利的因素。語言和文化上的優勢便是其中之一。我生長在廣東僑鄉，熟諳國語、粵語並略懂四邑（台山等地）方言，而粵語和四邑方言是當時唐人街的通行語言。其二是憑藉父母輩的一些鄉親朋友的關係。我是中山人，中山人很早就移居美國（如18世紀移居夏威夷的老一代華人大多來自中山）。在唐人街里經常能碰到很多鄉音未改的叔伯阿媽和鄉里鄉親。這些對於我進行實地考察、訪談和研究無疑是兩大便利。從理論的層面來看，當時研究唐人街並不是什麼新鮮題目。主流學派對此類移民社區早有定論。甚至連我自己的導師（著名都市社會學家約翰·羅根John R. Logan）都不怎麼看好我的選題。但我堅信能通過我的努力，從中發現新的和有趣的東西。我從直接的實地觀察中體會到，唐人街長期以來是美國華人移民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生活中心；是一個麻雀雖小，五臟俱全的小社會；是一個在白人至上的主流社會夾縫中頑強生存的邊緣社區。通過剖析唐人街這一活生生的個案，可以加深對美國少數族裔社區和其他族裔文化的了解和理解。此外，唐人街雖處美國，但與母國和海外眾多的華僑華人社區息息相關，保持著千絲萬縷、有形或無形的聯繫，存在著許多共同的特點和經驗。因此以紐約唐人街作為典型，解剖麻雀，應該可以從中找出規律和新的理論模式。選好了課題、並說服了導師後，我本著相信自己的感覺、堅信自己的判斷、尊重客觀的事實和運用嚴謹的科學方法的心態，對博士論文的研究計劃作了認真詳細的策劃。

長期以來，美國學術界以及政界、新聞界和娛樂界均對唐人街持負面的觀點，視其為光怪陸離、藏污納垢的罪惡溫床；是華人的避難所和貧民窟；是阻礙移民與主流社會溝通的一個文化落后、自我循環和自我生存的封閉社會。許多歷史學家和人類學家也大多把唐人街描繪成移民生存的栖身之處。或被描繪成移民進入美國主流社會的跳板，以此為落腳點，慢慢地被教化和同化，最終融入主流社會。在對美國唐人街的研究中，我重點集中在考察和分析這樣一個問題：唐人街是一個長期存在的移民社區。在這里，移民如何能夠在保存自己的族裔文化傳統和族裔整合的群体精神前提下，通過努力奮鬥而打入美國主流社會？我的研究結果是：唐人街是一個逐漸形成的有鮮明族裔文化、有獨特的經濟特色、贏得華人移民認同的全美最具特色的族裔聚居區之一。這一社區之所以經久不衰，不僅因為新移民源源不斷的遷入，更重要的是它

為移民在陌生的社會文化環境中逐漸適應、并最終融入美國主流社會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我對唐人街進行研究所取的立論觀點與當時在美國社會學界對移民社區研究領域影響最大的同化論截然相反。不應把唐人街置于美國社會之外，應把它看作是與美國社會息息相關的一個組成部分；不應把移民看作是有待開發的、守舊落后的、頑固不化的弱者，而應把他們看作是積極向上、勇于創新、能夠把握和改變自己命運的強者。我通過三個不同的側面 -- 少數族裔聚居區經濟；婦女在唐人街經濟的地位和作用；移民居住模式 -- 用不同的提問方式，從不同的角度對唐人街的內在機制和紐約大都市的華人社區進行了一年多的實地考察和訪談調研，并對美國人口普查的有關資料和大量數據做了詳盡的分析。從而提出與主流學派全然不同的新理論。我發現，華人移民擅長經商，善于利用本族裔的人力和財力資源自尋出路。唐人街自然便成為華裔移民集體奮鬥的一個重要基地。由此而形成的聚居區族裔經濟（the ethnic enclave economy），為不少新老移民創造了在美國立足的基本條件以及就業和生存的機會。我還發現，聚居區族裔經濟的發展大大地促進和鞏固了社區的社會組織結構，增強和豐富了社區的力量以及由此生成的社會資源和社會資本，為族裔成員提供各方面的支持和幫助。因此，我的結論是：唐人街充滿生機和內在的活力。它具有自我調節的內在機制，能隨著社會的變化而不斷地調整自己的社會經濟文化結構，以適應新形勢和人口多元化的要求，不斷地充實和發展。其主要的功能在于為華人移民（特別是那些不懂英文、勞動技能低的新移民）提供了主流社會無法提供的生存發展的機會和空間。也使華人移民得以保持特有的文化傳統，避免在融入主流社會的過程中喪失殆盡。從而為他們在美國安居樂業并最終融入主流社會提供了一條代價較小且切實可行的途徑。

回過頭看，當時確實是有一種“初生牛犢不怕虎”的銳氣，所以沒有受制于主流理論的約束，使我能從新的角度客觀地追尋華人移民及其社區的命運變遷，得出了與美國社會學主流學派（尤其是同化論）不同的結論。《唐人街》一書發表后，在美國社會學界，尤其在國際移民學、族裔關係學和都市社會學等領域發生了我始料不及的激烈反響和爭論。有贊同，有懷疑；有善意批評，也有全盤否定；甚至還有惡意攻擊。有的激進人士甚至指責我是“華人資本家的代言人”，“為剝削唱贊歌”。我的很多同事為此替我寫文章打抱不平。我對有建設性的評論和批評、甚至反面意見都十分重視并加以思考分析，不去斤斤計較地糾纏于那些不實之詞。我的這種姿態反而使我的獨樹一幟的移民社區理論倍受關注，也令我在學術界開始展露頭角。《唐人街》獲美國社會學學會1993年最佳學術著作榮譽獎。十多年過去了，這本書至今為止仍然是美國許多大學中的都市社會學、族裔社區、亞裔、華裔移民等課程所採用的必讀教科書。《唐人街》的中文版已于1995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在國內的華人華僑研究及社會學界也有一定的影響。

繼《唐人街》之后，我運用在唐人街研究中所建立的獨特的族裔社區基本理論，有機地結合定量和定性的方法，深入研究以下更廣泛的課題：新老唐人街的對比（我還對華人移民家庭以及華人社團組織如何影響華裔子女的教育和成長問題作了較深入的探討）；華裔移民社區與其他亞裔社區（如韓國城等）的對比；亞裔社區與其他少數族裔社區（如非洲裔和拉美裔等）的對比；移民及其後裔的就業、收入、職業分布和社會向上遷移的模式；移民青少年的教育與文化；族裔經濟和族裔企業家精神；族裔組織；東南亞難民的社會適應；中國國內移民居住模式與社會適應的關係等等。這些研究也取得了令人滿意的成果。

二、移民社會學理論的研究

我對移民社會學理論的貢獻之一，在於發展了“聚居區族裔經濟”理論（ethnic enclave economy theory）。在美國移民社會學領域，族裔經濟（ethnic economy）和聚居區族裔經濟（ethnic enclave economy）的兩個重要理論一直爭議不休。“族裔經濟”理論最早由社會學家博納西奇（Bonacich）、莫代爾（Modell）和萊特（Light）等提出。“族裔經濟”的概念泛指少數族裔群體成員從事的經濟活動，包括任何移民或少數族裔的商家業主擁有並經營的企業（或僱主和僱員屬同一族裔群體的企業）。最近，萊特和他的同事在更高層次上重新表述了這一概念。根據他們的重新定義，“族裔經濟”的含義包括兩方面：一是“所有權”。即族裔群體成員擁有和經營的企業，既包括僱主也包括同族的僱員和不付報酬的家庭勞力；二是“控制權”。即族裔群體成員所控制的僱工渠道（就業網），包括引導同族成員進入非同族成員擁有和經營的企業和行業，甚至進入主流勞務市場以及政府部門的渠道。族裔經濟的概念有著同一族群所有制和就業網的雙重性。因此對每個族裔群體的企業來說，它是一個中立的、不一定與本族裔文化有內在聯系的觀念。萊特一派認為，族裔經濟不僅包括中間人弱勢族裔的商家企業，也包括聚居區的族裔商家企業。還包括由同族成員控制僱工渠道和就業網的一些主流行業。這樣一來，無論任何一個族裔群體的僱主與僱員比率高低，均有各自的族裔經濟。像一些僱主比例高的族群如猶太人、日本人、韓國人、華人、伊朗人和古巴人，他們有自己的族裔經濟；一些僱員比例高但是控制著企業甚至政府部門招募員工的渠道的族群如非（洲）裔黑人、墨西哥人和中美洲人，他們也有自己的族裔經濟。這樣一來，族裔經濟與族裔社區和族裔文化不一定存在必然的聯系。

“聚居區族裔經濟”則不同。它雖然是族裔經濟中的一個特殊類別，但卻是一個內涵相對狹窄的觀念。它僅局限於族裔文化和同一族裔聚居區。因此不是每個族群的族裔經濟都可以被稱為聚居區族裔經濟。波特斯（Portes）和他的同事是最早提出聚居區族裔經濟理論的學者。與族裔經濟這一概念相比，聚居區族裔經濟的觀念並不包羅萬象，它是獨特的。也就是說，一個族裔群體聚居區族裔經濟的存在，必須滿足以下幾個條件：第一，這個族裔的群體內必須有

相當大比例的雇主、即創業者和企業家。第二，它的服務對象不僅僅限于本族裔的成員和社區，還須滿足主流社會大眾的消費需求。第三，它的經濟活動多元化程度高，不僅僅包括限于族裔社區內且有族裔文化特色的商貿活動和服務業，還包括與主流經濟接軌的商貿活動和製造業以及各種專門行業。第四，族裔成員以共同的族裔性和族裔文化價值觀作為雇主與工人、業主與顧客、委託人與受託人之間的日常關係和互動的基礎。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個條件，聚居區族裔經濟需要一個特定的區域，即一個族裔聚居區來支持。聚居區族裔經濟在早期的發展中，尤其需要這個地域環境。因為族裔聚居區內的族裔資源（包括資金、人力、市場、信息、信任和其他的社會資源）一般較其他區域更為豐富。波特斯一派認為，聚居區族裔經濟這一概念包含結構性和文化性兩個層面。從結構層面上看，作為族裔經濟的一個特殊類型，它包含了經濟活動和經營方式的多元化。因此在不同程度上，它酷似主流經濟的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的一些主要特征。一方面它超越了傳統小生意和家庭經營模式的限制。另一方面它又受本族裔社區結構的制約。在一個特定的族裔聚居區內，經濟活動受到族裔社區各種社會文化機構，如商會、同鄉會和教會等的控制和協調。從文化層面上看，聚居區族裔經濟受兩種文化因素的影響：受限于族裔性的凝聚力（bounded solidarity）和被族裔性所強化的信任（enforceable trust）。這兩種文化因素是族裔社區賴以支持和控制的機制，即以共同的行為準則和價值觀標準去認可和支持有益的經濟活動或反對越軌的經濟行為。而同一族裔群體的成員，無論是雇主或工人、業主或顧客，他們之間的關係大多是基於互惠互利的原則，並超越純經濟的僱傭和契約貨幣的關係。

我的唐人街研究為“聚居區族裔經濟”理論提供了有力的實證依據。例如，我在研究唐人街聚居區族裔經濟的一個重要行業制衣業時發現，許多不懂英語，缺乏有關勞動技能的新移民婦女通常在唐人街衣廠做工。那里的工資雖低，但是她們感到的是自己得到了在別處找不到的就業機會，而不是被同族老板的剝削。在她們看來，唐人街衣廠的工作有助於她們同時擔當多重角色——既做工掙錢又當妻子和母親。在唐人街里比較容易找到工作，而且工作時間也較有彈性。華人雇主比較理解她們的特殊困難，且對提早或推遲下班、帶小孩上班等做法較為寬容。唐人街里也容易找到托兒服務，購物便宜且方便。這些便利是在其他地方找不到的。同時，衣廠老板也要依賴華人移民的廉價勞動力。這種老板與工人之間無形的利益結合，不會出現在主流經濟的勞務市場。在唐人街里，基於共同族裔性的雇主和雇員的關係是互惠而不是強制的。相反，華人雇主在非華人聚居區開業做生意或僱傭非華裔的工人時，雖然可以有效的擺脫本族裔性的社會控制，不需要給予工人特殊的照顧，如容許帶小孩上班等，但是也可能要無意識地付出巨大的社會代價，如勞資糾紛、種族沖突等。本論文集的第十一章對女性移民在唐人街族裔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了比較詳盡的分析。

對於“族裔經濟”和“聚居區族裔經濟”的理論假設和實證研究的結果，至今尚存不少爭議。這主要是由於研究的角度、概念的定義和測量的不同所導致。我認為，爭論是有建設性的。總的來說，聚居區族裔經濟不是任何一個少數族裔群體均有的經濟類型。“聚居區”一詞在這里不是用來修飾“族裔經濟”這個概念，而是用於指出基於族裔聚居區內的經濟活動這一特殊的社會現象的本質。“聚居區”是指某一族裔群體及其內在的組織系統、社區結構和社會關係。聚居區族裔經濟這一理論概念的中心思想是族裔群體的經濟活動和個人的經濟行為會在不同的環境中（如在族裔聚居區內或外）產生不同的作用和結果。本論文集的第八章進一步闡述了我的這一觀點。當今美國的許多移民繼續兢兢業業地經營著族裔企業，將其作為沖破主流勞動市場重重障礙，在主流社會中攀升，提高自己社會經濟地位的有效途徑。他們還憑借著自己精通雙語和雙文化的優勢，及時抓住和利用經濟全球化及國際性移民潮所出現的各種新機會，進行跨國型的創業活動。這些族裔經濟活動一旦與族裔社區相結合，便能增強社區力量，更有效地幫助移民順利適應社會，並最終融入美國主流社會。

此外，當代美國華人移民社區的轉型在近年來尤為引起學術界的關注。我和南京大學社會學教授林閩鋼博士提出了族裔資本的理論分析架構，進一步發展了聚居區族裔經濟理論（詳見第九章）。我們認為，對於一個特定的族裔聚居區來說，金融資本、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不僅可以各自獨立發生作用，而且存在著有機的聯繫，共同發生作用。我們提出一個新的概念：把金融資本、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這三種資本的互動統稱為族裔資本。在這些新概念的基礎上，我們分別以紐約唐人街作為傳統的華人移民社區的典型，以紐約的法拉盛和洛杉磯的蒙特利公園作為新華人移民社區的典型來進行對比研究，分析族裔資本在華人移民社區轉型中的發展變化與相互作用。

三、移民第二代的研究

移民第二代特指在美國出生而在移民家庭中成長的一代人。通過對當前美國新移民第二代的文獻和實證研究的回顧，我與美國著名社會學家波特斯（Portes）提出了很有影響力的多向分層同化理論（segmented assimilation theory）。這一理論強調結構因素和文化因素的互動關係，提出同化的原因不僅在於移民族群的內在文化，還在於族裔社區中的社會經濟資源以及主流社會的社會分層和政策取向。移民第二代並不需要摒棄自己的族裔文化、遠離自己的族裔社區才能融入主流社會。在某種情況下，移民子女只有有選擇性的認同美國文化，有目的地依靠族裔社區的群體力量，才能達到預期的同化結果，最終融入社會的中上層。而盲目的認同美國文化，有時會適得其反，最終融入主流社會的邊緣和底層。1998年，我與我的博士生（Bankston）合著的《在美國成長：越裔青少年如何適應美國社會》一書中詳細地論證了這一理論。該著作聚焦越南難民這個最大難民群體的青少年的社會適應問題，探討解釋了身無分文

的越裔難民如何能重建族裔社區、越裔家庭如何依靠社區族群力量克服重重困難，在短時期內站穩腳跟，迅速進入美國主流社會，取得意想不到的成功。我還對華人移民家庭以及華人社團組織如何影響華裔子女的教育和成長問題作了較深入的探討。我認為，成功的關鍵是如何使個人整合進家庭和族裔社區，以及如何使族裔社區整合進主流社會。由于這本著作是對越南難民孩子適應性的首次深入研究，觀點新穎，理論清晰，因而獲得了廣泛的好評和援引。并獲得了美國社會學學會1999年最佳學術著作獎。我本人也因此被頻頻邀請到各大教育研究基金會、名牌大學，如哈佛、普林斯頓等以及有關國際會議和研討會上發表演講。

最近，我剛完成了一個重要的研究項目。研究的課題是關於洛杉磯移民社區資源的族裔差異及其對移民第二代教育的影響。該課題關注的主要問題是：為什麼相同經濟地位、但不同族裔的移民小孩的教育程度和學業成績會有頗大的差異。我摒棄了種族和族裔文化優劣性的觀點，而集中于研究族裔社區。深入探討社區資源的族裔屬性及其產生的原因。我認為，族裔資源孕育于族裔社區組織之中，它作為一種重要的社會資本，能夠幫助低收入社區移民的青少年克服他們在結構上的劣勢。族裔資源的形成和社會資本的積累與聚居區族裔經濟和社區結構關係緊密。聚居區族裔經濟的強弱，直接影響到社區力量的強弱和族裔資源的差異，進而影響移民第二代的教育結果和將來就業去向。我目前正在根據這一研究成果撰寫一本論著，題目暫訂為《洛杉磯的唐人街和韓國城--論社會資本如何在貧困社區中形成》。

四、美國亞裔社會的研究

當代美國社會，亞裔族群眾多。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主要由來自中國、日本和菲律賓三個國家的移民及其後代組成。當中也包括少數來自韓國和印度的移民。到了21世紀初，亞裔社會已發展成為由來自中國（包括香港和台灣），菲律賓，印度，韓國，日本和越南等20多個國家的移民或難民的族群組成，總人數達一千二百萬之多，約占美國總人口的百分之四。華人不僅是其中最大、也是最早的移民美國的亞裔族群。其歷史可以追溯到19世紀40年代末。由于近年來國際移民潮的沖擊，美國華裔的總人口從1960年的不足24萬成倍增長至2000年的近300萬之多，占亞裔總人口的四分之一，占美國總人口的百分之一。二戰前的亞裔社會由于受到諸如美國西岸反華排華運動、1882年聯邦政府的排華法案以及後來的一系列反亞排亞法案的負面影響，是一個長期在以白人為主導的主流社會邊緣徘徊的弱勢少數族裔群體（詳見本論文集第二章）。二次大戰後，盡管經歷了六十年代的民權運動，亞裔的社會地位得到不斷地提高，但是整個族裔群體仍然處於弱勢地位。還時常被白人以自相矛盾的眼光另眼看待，既被看成是永久外國人，又被看成是模範少數族裔（model minority）。無論如何，他們總覺得亞裔不是地道的美國人。

美國華裔研究學 (Chinese American Studies) 是亞裔研究學 (Asian American Studies) 的一個分支，從屬於少數族裔研究學 (Ethnic Studies) 的學術範疇。如同其他族裔研究學(非裔研究學和拉美裔研究學)，亞裔研究學是60年代在美國風起云湧的民權運動中催生的革命性產物。其學術領域跨越人文科學、社會科學以及許多專業的學科，如文學、歷史學、社會學、人類學、心理學以及教育學、法學、都市規劃學、社會工作、社會福利、公共政策等等。其主要關注的研究課題十分廣泛，包括亞裔群體內部的多元化的歷史、文化傳統、社區發展、亞裔社區與主流社會的關係以及與移民來源國的關係等等。很多大學在1970年代以來創建了亞裔研究學專業和跨學科學位計劃 (Interdisciplinary Degree Program)，為大學本科生和研究生開設了專業課和副修課。到了90年代，亞裔研究學發展得更加學術化、正規化和制度化。許多大學先後建立了亞裔研究學系，確立了這一年輕學科的合法地位。

我的社會學研究對華裔研究學和亞裔研究學的發展也影響很大。我與我的碩士生 (Gatewood) 合編了《現代美國亞裔社會》一書，聚焦亞裔社會和族裔群體面臨的最緊迫的問題，得出如下結論：(1) 美國亞裔社會的多元化主要表現在來源國、社會經濟地位和居住模式的多樣性及其所導致的明顯差距。這為亞裔大群體的團結和整合造成了新障礙；(2) 亞裔社區各族裔群體因不同的文化和社會經濟背景而導致不同的同化和社會流動軌跡。對於研究社會流動來說，經濟和結構的因素比族裔 (或種族) 的因素更具有決定性的意義，但必須同時考察兩者間的互動；(3) 個人經濟上的成功並不自然地意味著會被主流社會完全接納。亞裔美國人至今仍被看成是外國人而不被看成是純粹的美國人；(4) 移民和第二代之間的生活經歷、價值觀念、意識形態的吸收以及同化的速度差異很大。這些差異也是導致兩代之間的關係緊張以及不同集體行動方向和策略的主要原因。總之，移民和全球化過程的跨國聯結，不僅導致美國的亞裔人口和社區多元化，而且創造了新的社會適應和社會流動性模式，從根本上挑戰現有的亞裔社區理論和族裔同化理論。最近，我還與爾灣加大的一位社會學教授 (Lee) 合編了另一本題為《美國亞裔青少年文化與族裔認同》的著作。這本著作通過聚焦亞裔美國青少年不同的文化實踐，探討他們如何通過當代美國社會的多元文化，為自己創造一個族裔文化和主流文化相融合的空間，并在其中自我發展、自我教育、自我完善和健康成長。

值得一提的是，亞裔研究學的發展過程並非一帆風順。以我所在的洛杉磯加州大學 (UCLA) 為例，1969年以前，在洛加大每年開設的數千門文科課程中，沒有一門是有關亞裔人口、歷史和社區的課程。而亞裔學生的比例卻在不斷上升。經過亞裔學生和教職員工與校方的多次交涉和敦促，洛加大終於在1969年開設了第一門題為《美國的東方人》的選修課。此後，隨著亞裔學生人數急劇增多，要求開設有關亞裔的課程的呼聲越來越高。洛加大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終於正式成立了亞裔研究跨系學位計劃，成為當時全美大學中唯一同時提供亞裔研究學主修和副修學士學位以及碩士學位的跨系學位計劃。到了20世紀90年代中期，隨著美國亞

裔人口（尤其在加州）的進一步上升，洛加大的亞裔學生比例從不到10%激增至40%。學校的跨系學位計劃的本科生也增至將近200名、碩士生25名、教授20多名。每年開設的課程增至60多門。其中包括《亞美歷史》、《亞美文學》、《當代亞美社區》、《亞美民權運動》、《亞美人的個性與精神健康》、《亞裔婦女和女權主義》等。還包括多門有關華裔的課程，如《華裔文學》、《華人移民》、《華人社區》、《華裔家庭》等等。每年選修這些課程的學生達2,000人次之多。洛加大的亞裔研究學跨系學位計劃雖形同正規的學系，而且是全美規模最大、師生陣容最強一個亞裔研究學計劃，其建系的過程仍阻力重重，十分艱難。2000年，我接任這個跨系學位計劃的主任，目標就是要全力推動和建立正式的學系。我和全體的師生員工經過多年的不懈努力，終於在2004年9月完成了預定的建系的目標，正式建立了亞裔研究學系。我則有幸成為這個新系的創始人之一和首任系主任。事實證明，亞裔研究學已經成為獨立的學術領域。

* * *

談完我的學術之路，下面略談一下我的個人經歷和體會。

如果說我可以自詡有一些長處的話，執著便是其中之一。客觀地說，我事業上的成功，頗有些“無心插柳柳成蔭”的味道。當然，這更是我執著地堅持己見、刻苦奮鬥的結果。我的一些學生和讀者常問我這樣一個問題：“作為一個名校的女教授，洛杉磯加州大學亞裔研究學系的首任系主任，以及美國社會學學會理事，北美華人社會學學會會長，您如何處理事業和家庭的關係呢”？我覺得，事業和家庭不應該是對立的。我很愛我的事業，更愛我的家庭。我很幸運，因為我對事業和家庭都感到十分滿足。1984年我只身赴美留學時，我的兒子還不足十個月，還是個小“baby”。那時真有點“拋夫棄子”的淒涼之感。

寫《唐人街》的時候，我剛剛開始在路易斯安那州州立大學任教，也剛剛開始重新學當媽媽。當時，我面臨好幾個挑戰。一是我剛出道。雖說是從學校到學校，但身份變了，既要教課，又要搞研究、出書出論文，壓力很大。在美國的學術界里有句行話，“要么出書，要么消失”（publish or perish）。二是我剛與分別了將近五年的兒子相聚，當時丈夫還在歐洲工作。我們母子倆不僅要重新互相適應，還要相依為命，這個“單親”媽媽可真不容易當。三是從美國東北部移居到南部較為保守的地區，對當地的環境、文化和人情世故都需要重新適應。四是要一個人擔起家庭生活的擔子，一年還得額外多教四門課（每年共教八門課），以增加收入維持家庭開銷。怎麼辦？工作一點也不可以耽擱，孩子的養育一點也不可以疏忽，那就只有擠時間，拼速度，充分利用一天的二十四小時，高效率地工作和生活。我曾聽我的導師說過，他的一個學生是單親媽媽，畢業後帶著五、六歲的女兒從東北部移居到西部任教，她採用了早睡早起的作息時間，晚上跟女兒一起早睡，凌晨三點便起床寫作，工作效率很高。我覺得這個主意

不錯，便照葫蘆畫瓢，跟著去做。聞雞起舞，辛勤筆耕。就是靠著這些擠出來的時間，我在5個多月的時間中完成了《唐人街》的寫作。另外，那幾年也是我發表學術論文最高產的時期之一。好几篇學術論文就是這樣吭吃吭吃地擠出來、發表在《美國社會學評論》和《社會力》等一流的學術刊物上的。人就是這樣，有大的壓力才有大的動力。當然，更重要的是要有明確的目標和正確的方法。那時候我每天早上三點鐘起床，在夜深人靜的時候開始寫作。七點多鐘就把兒子送到學校，下午五點才接回來。然後買菜做飯，操持家務。那時兒子剛來美國，人地兩生，語言不通。再加上一下子從由一家老小簇擁著的“小皇帝”的熱鬧大家庭掉到只有一個陌生媽媽而沒有一個朋友的“新”家，還要每天在充滿陌生面孔的學校（80%的學生是黑人）呆上近十個小時，實在是難為了孩子。最近看了兒子寫的自傳中特別提到的這段經歷，我還感到有些心酸。但是，耕耘的結果是收穫，奮鬥的結果是成功。我的事業上的成功，有我兒子的一份功勞，也離不開我丈夫的理解和支持。“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王國維描述的做學問要經歷的第二重境界，我深有體會。

人的時間和精力有限，很難面面俱到。但我的信條是要“魚與熊掌兼得”。要想事業成功，就得花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對於我們職業女性來說，事業應該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個組成部分。事業令我們充滿自信，事業令我們生活充實。沒有事業就等於失去了自我。但是另一個極端是，不少功成名就的女性，要末是形單影只，孤身度日；要末是家庭離異，後悔不迭。在我們學術界里，時常聽到身不由己的嘆惜聲。也有一些女強人厭倦繼續在第一線上沖鋒拼搏，希望退居二線，多花時間相夫教子。殊不知，真的一退下來，並不開心，有的人甚至連“自我”都給丟了。

事實上，只要處理得當，事業和家庭並非總是對立，非要取一舍二不可。我們一家三口在人生的旅途中各自努力，各有建樹。兒子剛從麻省理工學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 MIT）獲得學士和碩士學位，并于2006年秋季進入斯坦福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攻讀計算機科學博士學位。丈夫也和我一樣，為了自己的事業兢兢業業地辛勤耕耘。我們都有自己的事業，更重視家庭的和諧，其樂融融。可以這樣說，女性的事業以及由此而建立的自尊、自信和自我是維持婚姻和家庭幸福的潤滑劑。否則的話，一天到晚只是顧及柴米油鹽，鍋碗瓢盆，生活就會變得像清湯寡水，淡而無味。從更高的層次來看，傳統的“賢妻良母”已不能滿足現代家庭丈夫和子女的需求了。只有自信才能獲得自尊。事業型的妻子母親大多會贏得丈夫和子女的尊重和愛戴並引以為自豪。總之我有一個信念，不屬於我的，我不勉強，只要是屬於我的，我一定會努力爭取，好好珍惜。知識和事業是屬於我的，兒子和丈夫是屬於我的，都不能丟。生活的樂趣在於，要做學問，要從事行政和社會工作，還要干家務事，缺一不可。事在人為，沒有時間就想辦法去擠時間，提高效率，用巧干加苦干的方法。事

情多，怎麼辦？安排主次先后，分清輕重緩急。人生短暫，既要干得轟轟烈烈，更要活得開開心心。這是一種大境界。就我來說，我總覺得我很幸運，很快活，也很滿足。

“眾里尋他千百度，回頭驀見，那人正在，燈火闌珊處”。我希望通過這本中文論文集，把我的部分研究成果介紹給廣大的中國讀者和海外同胞，讓各位能更深刻地理解美國華人社會的存在及發展的重大歷史和現實意義，從而體會到海外僑民艱苦創業、繼往開來的獻身精神。

社會學之路，我還將繼續走下去。

周敏